

· 告 · 别 · 二 · 十 · 世 · 纪 · 哲 · 学 · 随 · 笔 · 丛 · 书 ·

QUEXI DE QUANLI

缺席的权利

阅读、讲演与交谈

张志扬·著

二十世纪留下了

一块创伤记忆的无字碑

它冷冷地注目走过它的

任何思想

看复活的理性

是否撒谎

或遗忘

●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1 号

特约编辑 郑西海
责任编辑 邵敏
封面装帧 甘晓培

·告别二十世纪哲学随笔·

缺席的权利

——阅读、讲演与交谈

张志扬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丹阳兴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 插页 5 字数 190,000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7-208-02129-5/1·34

定价 14.00 元

总 序

近来，随笔在全国方兴未艾，这或许是因为人们发现，这种贴己的、自由的文体，在写作和阅读中建立起了一种较之其他文体更方便沟通 and 理解的纽带。但我们恰恰是迟疑着不信任轻易许诺认同前提的沟通和理解。

我们持有一种试探的入思态度和与此同步的写作态度，即既与诗化、浪漫化保持距离，也不在一般意义的人生沉思或幻想里侠义抒情，不在大而无当的问题中徜徉，逃避尖锐地提问和自我审视。

这当然是一种夜行。我们苦于不知道怎样给自己如此夜行的文字和写作“命名”。

因为我们并没有成熟的、形式臻于完整的文字奉献给成熟的时代和成熟的读者——这里每一个“全称”词都需要限定，诸如“我们”。

“我们”是指这套丛书的作者们，它敞开在未知的、陌生的人群里，那里或许会、甚至一定会酝酿着前面文字和文字形式的颠覆。“我们”是一个虚拟的假设。但是没有这假设，我们几乎寸步难行。

FJEG / A

最初的动机并不是同文体而是同作为文化范畴的时间联系在一起。

作为文化范畴的时间，是一定的文化背景下的时间概念。这套丛书的设计正值“二十世纪即将过去”，是我们已经经历并且还在经历着的。告别二十世纪，在我或我们的理解中，即回答对于一代甚至几代中国人说来——这个世纪意味着什么。

换一个角度说，要摆脱中国文化重复的困境，方式之一，就是要沉淀一些问题，找到这些问题的界限，使我们有可能面对将来。否则我们即使在物理时间中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实际仍生活在二十世纪，甚至更久远的时候，就像许多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传统阴影中一样。

这些问题大致涉及到客观真理问题(必然性、连续性、决定论、目的论都属于它的范畴)，理想问题，主体性问题，方法论问题，语言问题，客观性问题(既反形而上学本体论、又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个体性问题，以及超验的中立性问题……当然还可以有另外的归纳。必须说明的是，这些问题并不是每一位作者都直接论述的，但却都以自己的方式涉及到。

事实是，这些问题的深入引起的哲学的革命在西方早已发生，而在中国，它们也已然成为入思的不可或缺的问题意识背景。

必须强调并区分的是，这里所说的背景，可能是问题意识的知识视野，也可能是在问题的反省中个人经验断裂的敞开。即是指引着、隐喻着超验的个体有限性的界面的敞开。它较之知识视野的横向关联更具有一种当下性的纵横开阖的张力。

我们强调与语言事件相关的个人的初始经验。

即日常语言说的个人对自身经历和遭遇的反省。这种经历和遭遇如果不流失于重复的记忆,那它一定被置换了背景,即它一定是在问题意识的背景上被反身观照着。

这种反身观照已经是语言化的,即经历着既成语言向生成语言的转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的经历和遭遇在二十世纪问题的审视中已成为个体案例的分析,由此二十世纪的问题,即便是西方的问题,也不再是一种远距离的知识性的取舍,而是一种切身着的问题的表达或表达的契机。

没有这种问题意识和将问题尖锐化以冲破传统的努力,文化民族主义的源远流长和历史理性主义的坚不可摧几乎不可能让自律个体崭露生命的头角。

于是我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问题意识背景出发,接近着、或者提出了汉语哲学的问题,为着在生存、思维、表达一体的语言中找到问题的生成与转换,亦为着将个人的经历和遭遇中的问题纳入可整合尤可疏导的学术规范,成为在有限的前提下可理解和可沟通的。

向关心、支持这套丛书编辑、出版的出版界朋友致谢,他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邵敏先生、上海远东出版社的郑西海先生,上海三联书店的倪为国先生。他们的共同努力使这套丛书得以问世。

萌萌

1994年12月4日于海南大学

目 录

问题

- 自省的身位(代序)..... 3
文字, 偿付的与欠负的 6

阅读

- 引子 13
- 柏拉图爱论同儒家爱论的差别 15
- 性, 活着的死亡意象
——读电影《本能》的事实陈述 22
- E 弦上的咏叹调
——辨析《一颗冬天的心》中的两个音质 31
- 找一个理由就能活 45
- 忌恨 49
- “忏悔”的皈依 55
- 痛苦、智慧、信仰 65
- 拯救专名的荣誉
——重申“个人真实性及缺席的权利” 75
——专名与知识分子 76

2 目 录

二 非专名的知识分子意识	80
三 缺席,专名不应让渡的权利	84
启蒙思想中死去的与活着的	91
上篇 读书笔记	91
一 康德《答何谓启蒙?》 1784年	91
二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 1947年	94
三 福柯《论何谓启蒙》 1984年	99
四 利奥塔《何谓后现代主义?》 1979年	104
下篇 读书报告	105
一 西方启蒙思想分类	105
二 启蒙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109
三 中国文化的启蒙与现代性问题	114
理想的膨胀与坍塌	
——描述理想的内在不自治性	120
汉语言的能说与应说	138

讲演

重复·“十字架”与“圆”——“无聊”的语境	155
一 “荒谬”与“无聊”	155
二 “十字架”与“圆”	157
三 “是不是”与“该不该”	169
四 “就是那么回事”	177
五 “死的抓住活的”	186
六 时间的公证与缺席的权利	194

交谈

引子	203
交谈一 上海 缺席	205
交谈二 平顶山 不可理解性	218
交谈三 瑞典 个人	232
交谈四 西安 道德主体	242
交谈五 南方 汉语言	254

问 题

自省的身位

(代序)

“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文化”，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了，无论在实践上或思想上都有极丰富的经历。而与此相应的“文本”，同它表现的“事件”比较起来，在历史的天平上，却有一种令人怅然的倾斜。换句话说，靠“文本”的碑石能将惊心动魄的“事件”刻骨铭心地警醒于现实吗？或者，对文字或经验解读的心灵消受得了苦难记忆并能转化成生命的原创力吗？汉语言作为听说读写的中介能担当此生成转换的命运吗？

我怎敢苛求前人、他人。仅就自己的经历，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每当用文字表达时，常常处在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

提笔千斤，落笔四两……

我也曾想过一代文风的败坏，它的有形无形、有意无意的桎梏，妨碍了自由敞开的生存和初始经验的积累。所有这些，我都意识到并检讨过；还假定了一种类似物理实验的正常条件，试探写作的零度。可惜做不到，不仅还因袭着时间重负的我做不到，那些年轻得多、外部环境无碍得多的海内外学子，好像也没做

到；或许时候没到吧，但愿如此。

难道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至少经历的事件与表述的文字是脱节的。还有，经历者有经历，其中包括压抑的经历及其扭曲的感受使经历难以释放氤氲而关联的意义；非经历者无经历，即使有敏捷而沉着的文思也只能面对间接的失重的文本，终免不了历史的遗憾而难逃前历史期常犯的重复。远的不说，一个二十世纪，我们重演了多少苦难的记忆？有经历者重演着历史的经历，已不可说了；那些无经历者在无经验中还多少重演着中国人惯为常态的经历，几乎象宿命，更不可说了。

无奈，我何必不抱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让一切该去的该来的在时间中带去带来。偏偏又不，意识一旦意识，即便意志尚不具备，我岂能不到意识的对象化中经历意识的无能与悲哀。对于我，也只剩下这一条路可走了，既然文字给予我只这么多。

给出限度，给出一个或几个层面的限度，这正是我要做的。

并非为了立论，这儿还不是立论的场地，我只是想更直接的采撷那些粗粗剥离了的经验。

西方自尼采后，有一个将存在从价值中拯救出来的疯狂的挣扎，存在始作生成性而有更新价值的能力。中国一面称文化断裂，一面仍然让不变的价值规定着我们的存在，以至我们存在到如此地步：一是一切，一切是一，任何例外都是非存在的。结果，在扼断、窒息生命之为生命的原创力这个生长点上，二十世纪的衰亡又重复着十九世纪的衰亡。中国文化非如此这般地重演衰亡才算显示出它的生命的持久与永恒吗？

一百年来，一个巨大的民族心理症压迫着我们：“学习西方”。“强迫”也罢，“恭敬”也罢，“老老实实”也罢，“遮遮掩掩”也罢，“体”也罢，“用”也罢，不管你走不走西方的道路，你必须学习

西方，“拒绝”或“回头路”是没有的。然而，就在这个“学习”前的“限定词”上，我们耗费了太多的时间与生命，缴纳了太多的学费，现在总算悟出了一点道理：不可能是西方的中国，也不可能是中国的中国，只能是现代的中国。这个道理本来是可以不要一分钱而自明的。

但什么是现代中国的“现代性”，它和中国的古代性有什么不同，和西方的现代性有什么差别？

他人有他人的说法，我更倾向于在汉语言哲学及汉语言现代学眼界内描述它，只因这种描述的经验性、入思性和试错性，我才自我宽解为汉语言哲学随笔式的描述，为自己，也为别人，探路。

如果我不幸走到了人迹不到的断绝之地，也决不想立界碑窃道德之名：“生命在别处”。

宁愿像马里昂巴德花园中的雕像：

手指着悬崖的那边，海的尽头……

1995年元月11日

文字, 偿付的与欠负的

在《读神的节日》之后, 我写了《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 辨析了本体哲学、主体哲学、存在哲学, 从巴门尼德的命题一直清算到海德格的命题。下面承接的应是语言自身, 英美、法、德三种“语言哲学”的空间揭示及其层次变换的可能性。这是我目前正在做的事。

从目的上看, 我已经做完, 得到的只是语言的“两不性”。

也就是说, 从“本体之辨”、“主体之辨”、“存在之辨”到“语言之辨”, 从语言转向的哲学史前提到语言自身, 成形的印象, 远没有后现代论者那样“解放的乐观”。

传统形而上学标榜的决定一切的“本有”, 不仅常常被“例外”所推翻, 而且它赖以表达的语言也提供不了自洽的逻辑证明, 但这一点也不就是说: “本有不存在”。

“语言不能证明本有存在”和“本有不存在”之间, 没有必然的逻辑推论可循, 宁可说:

A、语言不能证明本有存在。

B、语言也不能证明本有不存在。

二者同时为真。这是语言的显隐二重性所致。我把 A、B 叫做语言的“两不性”。

面对如此悬置的“本有”, 活生生的个人哪里就有那么干净利落的举措: 或本有而“有所适从”(“只准这样, 不准那样”), 或本无而“为所欲为”(“怎样都行”)。他只能“担着点”: 不靠有也不靠无地自律。

因而, “个人真实性及其限度”, 只有到这时才成为新的启蒙问题被提了出来。也就是说, 继面对“神”的人之启蒙后, 现在的现代性更有面对“人”的个人之启蒙。这是目前欧美哲学界正展现着的景象:

个人是怎样的、能是怎样的。

继续准备“语言之辨”当然不是我的生活的全部, 其间穿插的偶然性也时常打断我的思路。例如, 1991年3月, 我去上海参加了一个小型座谈会, 作了《个人真实性及缺席的权利》的发言。没想到“缺席”二字引出不少瓜葛, 接着便有1992年平顶山同仁间的争论。我的发言“悼词与葬礼——评德法之争”, 遭到了尖锐的反驳。

我是承认并主张理解差异的人, 当然不怀疑这些反驳的正当性。只是我发觉, 仅仅停留在西方哲学的清理上, 终不是一个交谈的正当切口。加上两个会议的需要, 我中断了“语言之辨”的写作, 把原来后续的计划提前了。

按照计划:

A、清理西方哲学史直到当下, 找到西方哲学不断现代转型的内在契机, 以期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有一个切实的理解。

B、将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作为参照(不是尺度), 再清理中国哲学及文化思想现代转型的可能性问题, 以期明晰“现代哲学的维度”。

C、“A、B”的目的,是想回到“个人真实性及其限度”这个中国文化的“盲点”上来。

由于我起步太晚,我知道我没有精力或不如说没有时间面对中国哲学及文化思想通史。于是找了一个简便的办法,从近现代开始,更确切地说,是从近代进入现代的那个转折点开始,我选择了“启蒙思想”作为我进入中国文化现实的入门口。

我接连做了三个题目,试探着我对现实问题的感受能力:

1、拯救专名的荣誉——重申个人真实性及缺席的权利。

2、启蒙思想中死去与活着的——西方启蒙思想分类,附中国文化的启蒙与现代性问题。

3、理想的膨胀与坍缩——描述理想的内在不自洽性。

由于这三个题目的触发,使一个长期隐伏在我心中的汉语言自疑变得生动起来。它就是:

苦难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

“不可说”的自诩是否“不能思”的自欺?

我常常迷惑于中国历史的三个怪异:

1、自称为“道德渊藪”的中国,从孔子开始,历代思想家们几乎从未间断地沉溺于道德颓势的挽救中,结果还是一代不如一代地惊呼着。

2、自称为“集体意识”最强的中华民族,为何像“一盘散沙”样被中外所公认,至今,我们似乎仍未走出要么“板结”,要么“沙化”的怪圈。

3、自称为“空间意象、博大精深”的汉字,为什么一用它来记载世所罕见的苦难就会道德化而失重,以致使用这种文字的民族,陷入日常经验的重复中缺失深度的记忆而无力焕发创造的生命。

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千肠百结、欲思无能的底蕴？
但愿我能有持久的脚力。

〔间隔〕

其实没什么好说的，除了路程和脚力的反比，我还能说什么？

尽管写出的只是我好像说得出的部分，而那些浸染在每分每秒中度日如年的沉沦，恰恰被这堂而皇之说出的部分给葬送了，淹埋了，以致我现在连回想它们的勇气都已败坏。到这时，我才把一种责问指向自身：

苦难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

如果写出的文字没有永久的欠负，那它还不能不配已经表达的。

或许，

文字，只是一种葬礼吧。